

1774 年爆发的北美革命,并不是英国政府首次面对臣民造反。一个代际<sup>①</sup>之前,詹姆斯党人曾于 1745 年扯起逆旗,试图推翻英国王室,推举苏格兰籍王位觊觎者查理·爱德华·斯图尔特(Charles Edward Stuart)登上英国王位。很快这场叛乱便随着残暴血腥的“卡洛登战役”(Battle of Culloden)戛然而止,七千詹姆斯党人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战死、受伤或被俘。这一次,英国当局同样希望通过雷厉风行、痛下杀手的方式执行《强制法案》,分化孤立率先造反的马萨诸塞殖民地,借此杀鸡骇猴,预防革命烽火遍地开花。

不过,此举产生的效果适得其反。其他的殖民地,因为担心类似的行为可能会轮到自己,纷纷暗地支持马萨诸塞,同时以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的方式向世人宣告,他们将统一起来抵抗英国这个共同敌人。与会代表虽然相信北美未来依然属于英国,但现在只能暂时自求多福。代表们认为《强制法案》缺乏正当性,并准备了一系列陈情状呈交英王乔治三世。他们还咬紧牙关,批准武装本地民兵的计划,借此抵抗《强制法案》,同时宣布暂停与英国及其加勒比地区殖民地开展贸易,从而给英国制造经济压力。1774 年 10 月,在纷纷离开费城之际,代表们相互约定,如果相关陈情被置之不理,他们就将于翌年 5 月再

---

<sup>①</sup> “代际”(Generations),又被称之为“人类世代”,一般是指生物学意义上大致同一时期出生的人类群体。各国世代幅度多有不同,且随着时代发展,有延长的趋势,但总体上大致维持在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区间内。

一部分又是直接以奴隶为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易。因为武器交易数量庞大,运输船舶众多,可以十分容易地将发往北美的武器弹药混入其间。在南特,蒙陶图音公司以其与北美费城等地的传统商贸网络为掩护,私下运输武器;而这个家族企业对出海货船的命名方式,诸如“让-雅克号”(纪念卢梭)、“社会契约号”(致敬卢梭的代表作《社会契约论》)等,无一不彰显出对北美独立运动正义性的启蒙主义认知。

在所有向北美输出违禁武器的欧洲港口中,毕尔巴鄂得以位列其中,最令人感到惊诧。毕竟,这里传统上主要交易的是羊毛、纺织品,特别是鳕鱼——伊比利亚半岛雷打不动的主菜咸鳕鱼的必备原料。这种鳕鱼主要产自位于法属纽芬兰殖民地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以及位于马萨诸塞殖民地的马布尔黑德及萨勒姆。随着盖奇强推《强制法案》而点燃北美革命之火后,这条默默无闻的航路迅速化身为独立战争早期最为重要的欧美武器运输通道,其中流砥柱,则非卡萨·约瑟夫·加多奎·西约斯公司莫属。

约瑟夫·加多奎-麦泽塔(Joseph Gardoqui y Mezeta)于1726年在毕尔巴鄂创建了这家公司,创业伊始便和英国建立起紧密的商业联系。他的儿子迭戈·马里亚·德·加多奎-阿里奎巴(Diego Maria de Gardoqui y Arriquisibar)于1735年诞生。作为八个孩子中的老四,他从小便得到悉心栽培,以期来日继承家业。1749年,年仅十四岁的迭戈就被送到伦敦巨商乔治·海利(George Hayley)身边做了五年学徒,此人正是日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及约翰·汉考克从事进出口投机生意的幕后金主。在逐渐摸索国际贸易门道的同时,迭戈·加多奎也逐渐养成了足以让举止粗鲁的伦敦东区商人汗颜的英伦做派。当学徒时,迭戈抓住机缘,结识了海利的妻弟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这位立场激进的报人凭借自己反政府的呼号跻身英国议会,并在后来借此大力支持北美独立。

40



《迭戈·马里亚·德·加多奎-阿里奎巴》

(1735—1798)

微型画

1761年,父亲去世后,迭戈·加多奎子承父业,同时开始在毕尔巴鄂市政当局崭露头角。他一直与马萨诸塞商人,特别是马布尔黑德商人杰里迈亚·李、艾尔布里奇·格里以及塞勒姆商人约翰·卡波特等所谓新英格兰“鳕鱼贵族”们过从甚密。如果说家资颇丰的卡波特在当时算是“富翁”的话,加多奎堪称当之无愧的“富豪”,其家族资产用现在的币值计价,高达五百亿美元。当然,无论卡波特还是加多奎积累的财富,多少有不干

净的成分。例如,1771年至1773年,他们就精心筹划了将面粉从费城经西班牙再折返运至哈瓦那的航线,借此将数以千计的丝巾手绢从西班牙走私至塞勒姆。

英国颁行的《强制法案》,特别是停止波士顿港贸易功能的《波士顿港法案》,对商人阶层造成严重冲击。正因如此,1774年10月,在一个名为康科德的小镇,麻省议会(Massachusetts Provincial Congress)得以创建。领导人由波士顿商人约翰·汉考克以及雄辩家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担任,杰里迈亚·李及艾尔布里奇·格里负责筹建供给委员会。麻省议会下令组建民兵组织,其中包括少量精壮的“快速响应力量”——因为他们会在得到通知后一分钟内做好战斗准备,又被称为“瞬息民兵”(Minutemen)。供给委员会则负责为其提供

火炮、步枪及弹药。当然,在盖奇看来,麻省议会此举无异于创设独立政府,这不仅使他认识到殖民地造反已不可避免,更让他坚信必须像1745年扑灭詹姆斯党人叛乱那样,痛下狠手,从快从重予以残酷镇压。于是,他开始强化扼守波士顿湾咽喉地区的武备,并公然大肆操练英军。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自称“爱国者”,并且将支持英王的人鄙视为“保皇党”(Loyalists)的北美革命派,注意到了英军的种种迹象,于是想方设法武装自己。麻省议会呼吁,对镇上还没有被充分武装的“瞬息民兵”,尽快“提供可靠的火器、刺刀、弹带、背包、三十发药筒及铅弹”。当然,这一切还需要供给委员会加以落实。

41

1774年11月,杰里迈亚·李亲笔致信,向自己的老伙计迭戈·加多奎请求提供武器弹药。1775年2月,加多奎回复称,尽管这一要求性质特别,但他还是想办法找到并能够向北美方面发送本来为西班牙军队制造的三百支步枪及所配刺刀。他同时承诺,如果冲突持续,可以“继续效劳”。走私丝绸手绢是一回事,偷运步枪可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当时,西班牙还处于中立状态,尽管西班牙政府明显知晓其与北美之间的武器走私活动,但加多奎这样做,显然冒着失去与英国之间利益丰厚的贸易机会的巨大风险。他之所以这样做,想必是在成长岁月里受到乔治·海利及约翰·威尔克斯耳濡目染的熏陶,养成了同情北美人民正义事业的缘故。

1775年7月,加多奎运送武器的货船已经抵达马萨诸塞,供给委员会很快便将武器下发至殖民地各处。驻扎马萨诸塞的大陆军花名册显示,在新年到来之前,“新的西班牙武器”便已配发步兵。毫无疑问,这批武器随后便将投入实战,因为北美独立的枪声在迟疑了数月后,此时终于打响。

42

46 己为服务法国欠下了高达 200 万的外债,因此,除了法王应允的相关条件外,法国方面还应替他向债权人偿还上述债务。一直僵持的局面,最终被一位同样具备戏剧天分的商人成功打破。

1732 年,皮埃尔-奥古斯汀·加隆(Pierre-Augustin Caron)出生于巴黎的一个钟表匠家庭,在苦心修行后,年仅二十二岁便成为“服侍国王的御用表匠”。借此良机,他与一位富有的寡妇成婚,后来承继她的封地,并顺势将自己的名字也改为带有贵族特征的皮埃尔-奥古斯汀·加隆·博马舍。聪明、睿智、颇具音乐天赋的博马舍,在法国政经两界交游广泛。

1764 年,“七年战争”结束后不久,约瑟夫·巴利士-杜维尼(Joseph Pâris-Duverney)、雅克·杜纳坦·勒·雷·肖蒙(Jacques-Donatien Le Ray de Chaumont)等法国金融家组成的财团,选派博马舍前往马德里,与西班牙政府协商,申请获得向加勒比群岛及路易斯安那地区提供黑奴及农产品的专属经营权合同。博马舍在西班牙首都逗留一年之久,一方面积极参与跟西班牙方面的专营权谈判,另一方面醉心于西班牙的文学与文化。在巴黎一样,他依靠自身魅力赢得了马德里政经圈子的认同。这一过程中,他还得到了家族旧友福恩克莱拉伯爵夫人玛丽亚·特蕾莎·帕提诺(María Teresa Patiño, Condesa de Fuenclara)的大力协助。这位贵妇经常在位于马德里丽池公园附近霍塔莱萨大街的自家私宅举办文艺沙龙,想必她亲眼目睹过一年前因为《1763 年巴黎和约》签订而在丽池公园释放的炫目焰火。

47

博马舍受到和自己交流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及其权臣格里马尔迪启发,开始将专属合同与法西两国的政治结合起来。让法国外交大臣舒瓦瑟尔及法国驻西班牙大使欧森侯爵深感不安的是,博马舍将法国在专属合同中的定位,不仅表现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而且还同巩固《波旁家族协定》,协力对付英国这个公敌联系起来。不



《皮埃尔-奥古斯汀·加隆·博马舍》

(1732—1799)

让-马克·纳蒂埃绘制,布面油画

过,负责西班牙海外事务的“印度委员会”(Council of the Indies)看法不尽相同。他们将专营权交给了卡迪兹黑奴公司(La Compañía Gacitana de Negros),而这家公司的股东之一,便是后来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胡安·米拉雷斯(Juan de Miralles)。

博马舍返回法国时,虽然没有拿回专营权合同,但收获了可供自己毕生享用的政界人脉及文学灵感。最初,他选择从后者入手,创作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The Barber of Seville*)这部以西班牙为背景,描写三角恋关系的戏剧作品,其中不屈不挠的“费加罗”(Figaro)这一角色,日后更是让博马舍蜚声海外。同时,他还忙于跟威胁要让其倾家荡产的杜维尼家族后人打官司。后者于1773年指控博马舍贪污腐



败,并让其锒铛入狱达四个月之久。但是,博马舍针锋相对的反戈一击赢得了社会公众的支持,也和曾把自己投入监狱的巴黎警长安托万·雷蒙·加百列·沙丁(Antoine Raymond Gabriel de Sartine)结下了一段“最不可能”的深厚友谊。

沙丁一定是相中了这位曾一度沦为自己阶下囚的家伙所具有的卓越才能——在1774年,他嘱托博马舍赶往伦敦,秘密解决夏尔·莫兰德(Charles de Morande)诽谤路易十五情妇并以此实施敲诈勒索的麻烦。博马舍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成功封住了莫兰德的大嘴巴,给法国王室挽回了面子。就在他返回巴黎后不久,路易十五驾崩,路易十六继位。此时俨然已成为法国王室眼中大英雄的博马舍,听闻与德翁的谈判长期僵持的消息后,立马看破了其中的玄机。“德翁的诡计,”博马舍致信沙丁,“是欺骗那些想抓住他的人,将200万巨款放进自己口袋,之后继续滞留伦敦”。言下之意是,对付德翁这种“戏精”,  
48 只能像他自己这样的剧作家才能胜任。刚被提名担任海军大臣的沙丁立即将这一信息通报给正为德翁的麻烦头疼不已的韦尔热讷及路易十六。数月后,博马舍便重返伦敦,与德翁协商,让其交出秘密文件。

1775年夏秋之际,博马舍六次往返伦敦与凡尔赛宫之间,最终于11月与德翁达成最终协议。后者交出塞满秘密文件的铁质保险柜,法国王室则承诺允许他返回法国,条件是必须身着女装,且永世不得穿军服。此时,博马舍几乎已经无法再从事此类“秘密”旅行了——随着《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在巴黎和伦敦引发轰动,他成了英吉利海峡两岸妇孺皆知的红人。

在9月份造访伦敦时,博马舍偶然遇到了刚刚携带《橄榄枝请愿书》从北美远道而来的理查德·佩恩,此前佩恩和马萨诸塞驻英代表阿瑟·李一道拜会达特茅斯公爵,但陈情未果。返回凡尔赛宫后,博